约瑟夫斯历史文本在以色列考古发掘中的运用*

何　琛**

犹太民族历史悠久，考古发现通常被用来证明以色列这个新建立国家的合法性，也为民族认同提供了纽带和资源。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著作则是研究公元1世纪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以及更广阔的希腊化和罗马世界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本文结合马萨达遗址和加利利地区的尤塔帕塔遗址的考古发掘，分析了考古学家在利用约瑟夫斯历史文本时如何受民族主义和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诸多文本在以色列考古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用。

纵观当代考古学历史，很少有人能否定政治力量往往对考古实践和解释产生强大的影响。首先，考古是国家用在领土争端中的一种手段，考古发掘的历史用来赋予和民族相关的领土合法性，考古和民族主义的融合对国家内部机构和等级制度也会产生影响。其次，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对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进行分配时，其依据有时也来源于历史的传承。一方面，考古学越来越多地在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合法化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文化语境和国内外政治形势也对考古历史进行摧毁和消解。这种“文化清洗”受到战争、民族主义激情、种族内部冲突的滋养。在这些情境下，考古中的政治中立是无法实现的。考古学家在整合和利用诸如约瑟夫斯历史文本等古代文献时不同程度上受政治形势和民族主义影响。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成长于犹太祭司阶层。在公元66年第一次犹太战争爆发后，约瑟夫斯负责指挥守卫加利利地区的军队。在兵败被俘后，他跟随罗马军团来到耶路撒冷并在公元70年亲眼目睹了圣城的陷落。此后，约瑟夫斯在罗马完成了《犹太战史》《犹太古史》《自传》《驳阿皮翁》的写作。

* 本文的撰写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号：201704050204)的支持。

** 何琛，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石家庄铁道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犹太史。

他的著作成为后世了解希律王朝和古罗马地方总督管治下的巴勒斯坦历史、死海古卷、支撑拉比犹太教教义的口传文学的形成以及施洗者约翰和耶稣基督的唯一无间断的资料来源。[①]从希律王公元前 37 年征服耶路撒冷,到公元 70 年圣城陷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给巴勒斯坦地区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凯撒利亚、希伯伦、撒玛利亚、耶利戈、马卡鲁斯、提比利亚等等。正因为如此,约瑟夫斯的文本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发掘至关重要。考古遗址贝特·舍阿里姆位于以色列北部,在此发现的石馆和墓穴壁上都刻有希伯来、阿拉米及希腊文墓志,关于它的最早文学记载就来自于约瑟夫斯的《自传》。[②]本杰明·马扎(Benjamin Mazar)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此进行了考古发掘,勘测遗址位置时首先参考了约瑟夫斯的记载。[③]无论是雄伟壮观的马萨达,还是《圣经》中提及的小镇迦百农,约瑟夫斯的历史文本都在这些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挥了作用。

一、《犹太战史》与马萨达考古遗址

马萨达堡垒地势险峻,矗立在以色列中部犹地亚沙漠的岩石山顶上,俯瞰着死海。沙漠干燥的气候使得马萨达遗址完好地保存下来。《犹太战史》第七卷讲述了马萨达在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争末期被围困的历程。在书中,约瑟夫斯描述了罗马行政长官席尔瓦为围困和攻破马萨达所做的种种准备:修筑战争工事和哨塔,修建石坝和高大的平台安装巨大的破城锤和发弩机。[④]被围困在马萨达数月之久的犹太军队领袖以利亚撒(Eleazar)召集了他的追随者并发表演讲,将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归因于上帝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为了避免落入罗马军队手中遭受羞辱和奴役,他号召堡垒内的人选择英勇地死亡。他们抽签选出十个人杀死了马萨达堡垒内的 900 多人,然后其中一人杀死剩下的九人后也自杀了,留给第二天破城而入的罗马军队死亡般的寂静。仅有两位老妇人和五个孩子躲在下水道成为幸存者。[⑤]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有关马萨达的叙述在被遗忘了 1800 多年后,因为

① 参见[英]泰萨·瑞洁克:《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周平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 页。

② Mordechai and Peter Richardson, "Josephus' Galilee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Steve Mason, *Flavius Josephu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Volume 9: *Life of Josephus*, Leiden: Brill, 2001, p. 182.

③ B. Mazar, *Beth She'arim.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During 1936-1940*, I, Jerusalem: Masada Press, 1973, pp. 1-8.

④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book V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04-309.

⑤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book VII, pp. 320-40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登上犹太民族的历史舞台。虽然广大读者对约瑟夫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可信度颇为怀疑,然而他笔下描绘的犹太人对罗马军队的坚定抵抗和集体死亡的震撼画面引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马萨达的浓厚兴趣。[①]他们认为《犹太战史》中的故事恰好契合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信条:1948 年建立的以色列国事实上是历史上第二犹太共和国的延续,后者是在公元 73 年马萨达陷落后灭亡的。[②]约瑟夫斯笔下的马萨达为连接犹太的古代和现代历史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并进一步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秉持的信念:这片土地的主权从圣经时代即属于犹太民族。对于在 20 世纪初来到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马萨达神话为他们所宣称的犹太民族自治权利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传播媒介。[③]马萨达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出现在考古人员的视野中,奥尔布赖特(W. F. Albright)在他出版的《巴勒斯坦地区考古》著作中是这样描述马萨达的:犹太第二共和国在公元 70 年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罗马建筑是位于死海西岸的马萨达堡垒所遗留的罗马军队营地和城墙,一群犹太爱国者在马萨达坚守到公元 73 年。[④]然而,真正引发和推动马萨达考古热潮的是 1963～1965 年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它使这种古代和现代历史的延续感对普通民众变得更为切实可见。在此之后,以色列经历了和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的 1967 年六日战争、1973 年赎罪日战争、1982 年黎巴嫩战争等多次大规模冲突。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树立犹太军队英勇无畏的形象并且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寻找犹太之根,马萨达和以利亚撒被塑造成为抵抗罗马入侵者最后的堡垒,“马萨达永不陷落”这一口号家喻户晓。

本·耶胡达(Ben Yehuda)在他的著作《马萨达神话——以色列集体记忆和神话编造》中特别指出了夏玛利亚·古特曼(Shamaria Goodman)在马萨达考古发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首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时期将约瑟夫斯笔下的马萨达历史文本塑造成英雄传说并修复了可以攀登到山顶的“蛇道”号召民众来此参观。古特曼最终说服曾经在本·古里安政府任职国防军首领的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来主持 1963～1965 年举世瞩目的马萨达遗址考古工作。虽然考古发掘和约瑟夫斯的历史叙事相差甚多,然而当时的以色列身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圈中,处境就像是 1000 多年前的马萨达,接连发生的中东战争也对马萨达神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耶胡达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分析了

① Baila R. Shargel, “The Evolution of the Masada Myth,” *Judaism* ,28(1979), p. 360.
② Baila R. Shargel, “The Evolution of the Masada Myth,” *Judaism* ,28(1979), p. 361.
③ Baila R. Shargel, “The Evolution of the Masada Myth,” *Judaism* ,28(1979), p. 359.
④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The Archeology of Palestine* , London: Pelican Books, 1956, p. 165.

以色列是如何在青年运动、国防军、学校课本、媒体和旅游业、儿童文学和艺术等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对马萨达神话进行规制和传播，试图将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符号怯魅化，使它回归成为普通的考古遗迹。作为马萨达神话的历史来源，古特曼和亚丁对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的叙述进行了一系列颇有含义的增删。本·耶胡达在其著作第二章探讨了这些细节：马萨达的守卫者原本是烧杀抢掠的匕首党被改为奋锐党，在对马萨达附近的村庄隐基底进行考古发掘后，有证据表明这些守卫马萨达的所谓英雄曾经洗劫了这个位于死海岸边的村庄并对他们的犹太同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肆杀戮。罗马军队对马萨达的围攻时间也只有4～8个月，而非约瑟夫斯所记录的3年。另外，在马萨达考古遗址也未曾发现进行大规模战斗的痕迹。约瑟夫斯在著作中记录了以利亚撒先后发表的两次演讲以此说服对赴死犹豫不决的犹太同胞，并非民众所熟知的一次演讲。按照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的描述马萨达应该有900多具殉难者的骨骸，然而考古人员只发掘到25具，与书中记录相去甚远。马萨达堡垒的城墙上多处留下了大火的痕迹，而不是约瑟夫斯记录的一次大火。此外，在所有记录罗马军队围城进攻的材料来源中，他们都是有所突破后立刻进攻。[①]因此，罗马士兵不大可能在山下等待一晚然后次日再攻进马萨达城堡中。

然而，古特曼和亚丁这两位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得到以色列政府对马萨达遗址发掘从物力到人力的全方位支持，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对马萨达英雄主义叙事模式的推波助澜契合了政府需要和国家利益。亚丁在1965年出版的发掘报告中着重描述了马萨达堡垒的“英雄守卫者”，而对于在考古学上更为有意义的希律王时期建筑及用途却一带而过。[②]作为亚丁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考古系的后辈和同事，对马萨达叙事持有不同看法的本·耶胡达不大可能得到和亚丁一样来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也没有机会像他的这位前辈一样组织大规模的马萨达遗址考古发掘。对以色列民众而言，本·耶胡达的著作是否改变了他们对马萨达的看法仍然存在疑问。时至今日，马萨达作为以色列的一个象征符号仍然在政治演讲中被使用。2008年5月15日《耶路撒冷邮报》发表文章讲述了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参观了马萨达遗址后在演讲中公开赞扬马萨达精神并表示美国会支持以色列。[③]然而，在年轻的以色列一代人中，他们反对这些自己认

① Nachman Ben-Yehuda, *The Masada My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Mythmaking in Israel*, Madison: The Universti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pp. 58-59.

② Yigael Yadin, “The Excavations of Masada—1963/64 preliminary report,”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15(1965), pp. 1-120.

③ Herb Keinon, Rebecca Anna Stoil, “Bush to Knesset: Masada Will Never Fall Again,” *Jerusalem Post*, May 16 2008, p. 1.

为已经过时的政治手段，并呼吁改变以色列社会。马萨达再次成为一种象征：年轻人敢于质疑以色列历史上的核心观念，使马萨达神话走下政治圣坛。

二、《犹太战史》和加利利地区考古发掘

约瑟夫斯在《自传》和《犹太战史》两本著作中多次描写加利利地区的城市和村镇。《自传》主要讲述了他 66～67 年在加利利地区的经历。约瑟夫斯在战争爆发后曾经在此指挥犹太军队，因此他对加利利地区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自传》提供了这一地区在 1 世纪时的人口统计信息，包括人口性质、经济状况、文化模式和管理机构。约瑟夫斯在书中提到加利利地区有 204 座城市和村庄。[①] 尽管目前尚没有完整的地名清单供后人参考，然而对加利利地区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考察仍然得出了一个与约瑟夫斯所述非常接近的统计数据。其中一些遗址发掘出各种生活物资，进一步证实了 1 世纪前即有人在此定居。约瑟夫斯在书中提到名字的大多数地方已经被考古发现确认，虽然其中一些遗址地点还存有疑问。[②]在整个加利利地区进行过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令人惊喜。迦百农发现了 1 世纪的建筑物残骸。这里的定居点规模不是很大，但房屋排列整齐，样式简单。[③]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古城贝特赛达，发掘出公元前1 世纪的简易庭院房屋，其中的渔具证实了房屋主人的生计。[④]拿撒勒的遗迹较少，部分残留城墙和农具表明曾经有居民在此生活，周边还发现了几个 1 世纪的墓葬洞穴。[⑤]而位于下加利利地区核心地带的尤塔帕塔和位于戈兰高地的伽玛拉对于理解 1 世纪时期的定居点尤为重要。这些居住区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在罗马统治早期得到繁荣发展，最终毁于犹太战争中。

尤塔帕塔(Jotapata)是犹太和罗马军队第一次大型战役的战场，而约瑟夫斯在 66 年犹太战争爆发后被派到加利利地区做犹太军队的指挥官。他在《犹太战史》中四次描述了战场的地形：(1)隐藏在高高的山峰后面；(2)从北面可通往

① Josephus, *The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5.

② Chaim Ben David, "Were There 204 Settlements in Galilee at the Time of Josephus Flavius?"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62(2001), pp. 21-36.

③ Stanislao Loffreda, "La tradizionale Casa di S. Pietro a Cafarnao a 25 anni dalla sua scoperta," in Frederic Manns and Eugenio Alliata(eds.), *Early Christianity in Context: Monuments and Documents*, Jerusalem: Franciscan Printing Press, 1993, pp. 37-67.

④ Rami Arav, "Bethsaida," *Qadmoniot* 32(1999), p. 89.

⑤ Bellarmino Bagatti "Nazareth," in Ephraim Stern(ed.),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Land*, 4 Vols,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93, pp. 1103-1105.

山顶;(3)其余三面均是陡峭的山坡,特别是东面奇险;(4)镇上缺少自然水源。[①]犹太军队正是凭借着绝佳的地形条件得以抵抗罗马军队的强大进攻。除了尤塔帕塔之外,约瑟夫斯还在《犹太战史》中讲述了伽玛拉、耶路撒冷和马萨达另外三场战役,从所描述的战斗激烈程度以及文本篇幅长短来看,尤塔帕塔都排在耶路撒冷之后位居第二。作为这场战役的亲历者和主要指挥者,约瑟夫斯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尤塔帕塔从被包围到陷落毁灭的过程:韦斯巴芗率领罗马第五、第十军团加上提图斯的第十五军团围攻尤塔帕塔,约瑟夫斯命令把北面可以通行的出口用围墙包围起来并筑起一道堤防。犹太军队凭借着地势天险一直和罗马军队激战。他们疯狂地袭击罗马人并焚烧防御工事,迫使罗马军队暂停攻势退守到要塞。韦斯巴芗在混战中被弓箭射中而受伤。然而双方实力差距悬殊,罗马人不断利用大炮、弓箭和投石器进行进攻,最后用攻城锤捣毁了尤塔帕塔的城墙。经历 47 天的激战后,罗马军队攻进城中并大肆杀戮,至少 4 万名犹太人在此丧命。约瑟夫斯和 40 名同伴躲藏到隐蔽的洞穴中,被罗马军队发现藏身之地后他提议犹太同胞通过抽签来杀死对方以此避免落入自杀的命运。轮流抽签到最后只剩下约瑟夫斯和另外一个士兵,他说服了对方一同走出去向罗马人投降。[②]

一些学者认为,考虑到他在整场战斗中的表现以及最后时刻的投降行为,约瑟夫斯对尤塔帕塔战役的描述可信度值得怀疑。[③]因此,在对尤塔帕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和约瑟夫斯的历史文本进行梳理和比对。学者们认为尤塔帕塔遗址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然后又经历上千年自然气候的侵蚀,所以在遗址方位被确认后迟迟没有进行发掘。直到 1992～1998 年,莫迪凯博士(Mordechai Aviam)才开始参照约瑟夫斯的历史文本第一次对尤塔帕塔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长达 6 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占地 14 英亩的城镇遗迹,时代约为希腊化晚期到罗马时代早期。大约三分之一的城镇建在陡峭的东坡的顶部,另外三分之一建在圆形山丘及南坡,其余部分位于南部高原。5 个居住区被挖掘出来,包括小的私人住宅,其中水箱、浴室、储存区、炉子、黏土和石器皿等物资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在此区域还发掘出一枚罗马皇帝尼禄统治时期的硬币。[④]这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book III, pp. 160, 158-159, 158, 181-183.

②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book III, pp. 141-218, 316-408, 432-442.

③ Richard A. Horsley, "Power vacuum and power struggle in 66-7 C. E.," in Andrea M. Berlin, J. Andrew Overman (eds.), *The First Jewish Revolt: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87-109.

④ Mordechai Aviam, "Yodefat/Jotapata: 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Battle," in *The First Jewish Revolt: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Ideology*, Andrea M. Berlin, J. Andrew Overman (ed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21-133.

些发现和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对尤塔帕塔的地形风貌的描述基本吻合。

《犹太战史》中特别提到约瑟夫斯在尤塔帕塔修筑了防御工事。[①]考古发掘过程中在高地的北面发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防御工事。早期修筑的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晚期,而晚一些的防御工事大约在 1 世纪中期修筑,被认为是约瑟夫斯所为。除此之外,还发掘出散落在各个方向的 70 多个铁质弓箭头,以及 15 个石弩机上使用的箭头,尺寸和重量不等。大约 35 块投石机上使用的石头也被发现,均是用当地的石灰岩用手工凿子雕刻而成。[②]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描绘了罗马军队攻城后对尤塔帕塔进行了屠城,整个战役期间大约 1200 名妇孺沦为囚犯,4 万犹太人丧命。除了尤塔帕塔,约瑟夫斯笔下的其他三场战役遗址伽玛拉、耶路撒冷和马萨达都没能发掘出数量相符的遗骸。而在尤塔帕塔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就找到了很多骨骸。在 1999 年第二次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从居住区的一个大蓄水池下面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遗骸,技术手段表明他们曾遭遇过暴力袭击。[③]

总之,对尤塔帕塔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很多方面证实了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对尤塔帕塔战役叙述的真实性:在 1 世纪中期的尤塔帕塔确实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这座城镇被罗马时代早期匆忙修筑的城墙环绕着,在镇子北面山坡上曾经兴建过土木工程,弓箭、石弩和投石机从各个角度袭击了尤塔帕塔,许多人在被围困、战斗和陷落的过程中死亡。[④]当然,考古发掘和约瑟夫斯之间的叙述也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比如根据发掘出的居住区面积估算尤塔帕塔常住居民数量为 1500～2000 人,战争时即使有附近村落的难民流入,总数也应该不超过 1 万人。约瑟夫斯声称有 1200 妇孺沦为俘虏应该是接近事实的,然而死亡 4 万人这个数字确实是比较夸张的说法。这要归因于约瑟夫斯这位曾经的指挥官想要为自己和尤塔帕塔在战场上的失败找出合理的解释并进行悲情渲染。约瑟夫斯初到加利利地区时采取必要措施对防御工事进行了加固,但是最终却作为战役的指挥者亲自见证了军队的落败以及尤塔帕塔的陷落,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动机去夸大尤塔帕塔围攻战的惨烈。

---

①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book III, pp. 158-159, 174-175.

② Mordechai Aviam, "Yodefat/Jotapata: 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Battle," in *The First Jewish Revolt: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Ideology*, pp. 121-129.

③ Mordechai Aviam, "Yodefat/Jotapata: 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Battle," in *The First Jewish Revolt: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Ideology*, p. 131.

④ Mordechai Aviam, "Yodefat/Jotapata: 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Battle," in *The First Jewish Revolt: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Ideology*, pp. 121-129.

三、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和民族利益

以色列外交部前总干事多尔·戈尔德(Dore Gold)在耶路撒冷举行的2016年考古学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要重视英国托管时期考古发掘的原始档案文件,这些文件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地区连接起来,驳回了那些试图断开这种历史联系的人。他称赞考古学家"像以色列国防军一样"守卫着这个国家。[①]戈尔德还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4月要求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考古发掘活动的决议,宣称此举意味着国际社会试图将耶路撒冷从犹太历史上剥离。[②]由此可见,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考古学不仅仅关乎科学。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以色列NGO组织埃米克·沙威(Emek Shaveh)首席执行官米兹拉西(Mizrachi)宣称:当你掌控了过去,你就掌控了现在和未来。[③]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涉及各方社会和政治利益,已经成为巴以冲突的一个来源。时至今日,围绕考古活动所进行的斗争仍然在继续,各方意识形态的分歧部分来源于考古学的阐释,如何在现代冲突中利用历史成为考古学家的责任。[④]因此,考古学和以色列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以色列也尝试用考古学来证实民族神话,将这些神话尽可能与考古遗址的发掘相结合。一般而言,具有政治色彩的神话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们使一般社会秩序神圣化以及合法化,促进族群身份认同和社会和谐。[⑤]

拥有悠久历史的犹太民族一直十分重视考古学的发展,早在1920年即在耶路撒冷成立"巴勒斯坦及其古代史研究希伯来协会"。然而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并不利于大规模开展考古活动。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8年建国前的考古活动为第一阶段,此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相较于公众对考古的热情,专业考古人员数量极少;领导和参与考古发掘的马扎(Mazar)、苏肯尼克(Sukenik)和阿维尤纳(Avi Yonah)等人都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考

① Dore Gold, "Archaeology is Best defence of Jewish Connection to Jerusalem," 17th Annual Archaeological Conference, 8 September, 2016.

② UNESCO, Executive Board 119th Session, *Programme and External Relations Commission*, 11 April, 2016.

③ Daniel K. Eisenbud, "Archaeology in Israel as A political Weapon,"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4, 2017.

④ Tarje Oestigaard, *Political Archaeology and Holy Nationalism: Archaeological Battles over the Bible and Land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from 1967-2000*, Gothenburg: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2007, p. 9.

⑤ Baila R. Shargel, "The Evolution of the Masada Myth," *Judaism*, 28(1979), p. 358.

古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糅合在一起。[①]创建于 1925 年的希伯来大学此时人员和预算都有限,大多数历史遗迹位于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上,此阶段由犹太人主导进行的考古发掘仅限于贝特·舍阿里姆(Bet Shearim)遗址等零星任务。以色列考古学在建国后的第二个阶段奠定了更成熟的学科基础,史前考古学在这一时期崛起。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希伯来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摩西·斯特克里斯(Moshe Stekelis)在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史前调查。除了史前时期,以色列考古学在这一时期也超出了传统的追寻犹太民族根源的范畴,朝着更广阔的学科方向发展,比如在内盖夫(Negev)对古典时期遗址以及古老的沙漠农业制度进行了发掘和研究。这些古代沙漠社会启发了现代以色列人,使这个土地面积三分之二都是沙漠的国家逐步发展出高效的农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马萨达遗址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色列考古学经历了一场变革,开启了第三个阶段。首先,学科变化涵盖了各个方面,考古专业学科在兴趣范围和从业人员数量上都有所扩展。截至 1970 年,以色列境内只有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开设考古学专业,全职从业人员不足 100 人;而到了 2003 年,有五所大学可以授予考古学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位,超过 200 人成为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学者。[②]与此同时,公众对考古的兴趣明显下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召开的以色列考古大会通常有 1000 多名参会者,而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数字下降到大约两百到三百人,几乎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除此之外,考古研究的方向、重点和范式也发生了转变。比如在巴·伊兰这所以宗教著称的大学举行的考古学会议就摒弃了传统的历史方法。讲座专门针对诸如考古记录中的性别解释、社会结构和动态的重建以及考古方法中的定量等问题,没有大卫王和所罗门,也没有犹太人定居点,更没有《出埃及记》。[③]此阶段的考古学已经不再执著于民族神话和身份建构,在对待《圣经》、约瑟夫斯等历史文本时更趋于谨慎和理性。

① Rosen Steven,"Coming of Age:The Decline of Archaeology in Israeli Identity,"A public lecture on Israel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in 2003,p. 7.

② Rosen Steven,"Coming of Age:The Decline of Archaeology in Israeli Identity,"A public lecture on Israel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in 2003,p. 8.

③ A. Faust, and A. Maeir, *Material Culture, Society and Ideology: New Direction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Israel*, Ramat-Gan:Bar-Ilan University,1999,p. 54.

结　论

考古学家阐释过去的方式取决于他们个人和集体所相信的历史，以及用来恢复、分析和解释考古证据的技术。[①]由于在安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新国家的迫切需要，以色列早期考古学在科学上存在缺陷。为了证明民族主义存在于考古学这一事实，马萨达遗址等宏伟的考古项目因其存有偏见的假设、有问题的方法和错误的结论而被抛出并受到后代学者的批判。然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考古学并非罪不可赦。民族主义考古学与政治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源于考古学与政治进程的属性、传统和关联。[②]现代以色列建立于 1948 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坚持认为上帝在圣经时代就将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应许给犹太民族，在这片原本是犹太人家园的土地上建立以色列国是合情合法的。考古学被用来以“科学”的手段证实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和这片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约瑟夫斯著作为代表的历史文本在以色列的考古遗址发掘和研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对以色列的质疑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马萨达英雄主义叙事模式也逐渐失去了它曾经感召人心的力量，对加利利地区众多古代定居点进行考古发掘成为趋势。

以色列考古学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变革。以色列国内近两代犹太人都是在建国后出生并长大，他们已经不需要通过考古这种方式来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联系。最新一代的考古学家认识到前辈们对政治或民族主义的个人态度可能源于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无论这些个人的观点如何，都没有理由去错误地阐释考古数据，或者在考虑政治目的的情况下曲解它们。如何理解、阐释和整合古代文献与考古记录成为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对待诸如约瑟夫斯著作这样的历史文本时，最近一代的以色列考古学家采用了批判性视角，将文本视为对写作者的信仰、理解和实践的反映而不一定是准确记录。这些文本都是历史数据，但它们不再是衡量考古学的尺度。事实上，以色列的考古学家

① B. G. Trigger, “Romanticism, 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Philip L. Kohl and C. Fawcett (eds.),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5-266.

② B. G. Trigger, “Romanticism, 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 270.

正在改变考古学科的基本结构。他们在研究古代社会中的性别、游牧文化和社会动态等问题时已经逐渐超越历史文本范畴，不再完全受文本提出的问题的引导，而是结合更广泛的学科和理论知识。因此以色列考古学也朝着更加多样化和成为更重要学科的方向发展。